

经／典／点／睛

顾问◎周少川 主编◎李传印 汪高鑫

资治通鉴

ZIZHITONGJIAN



蓝天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经典点晴

顾问◎周少川 主编◎李传印 汪高鑫



蓝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资治通鉴/李传印,汪高鑫主编.-北京:蓝天出版社,
2008.2

(经典点睛)

ISBN 978-7-5094-0053-1

I. 资… II. ①李…②汪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编年体-
通俗读物 IV. K204.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4010号

经典点睛系列丛书

资治通鉴 /李传印 汪高鑫 主编

策 划: 陈学建 张 明
丛书主编: 杨京旺 金永吉
丛书副主编: 傅晓莉
责任编辑: 许志强
特邀编辑: 张 裔
封面设计: 耀午书装
出 版: 蓝天出版社
发 行: 蓝天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20×1000mm 1/16
字 数: 370千字
印 张: 19.5
版 次: 2008年4月第1版
印 次: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定 价: 29.80元

前 言

纳素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书籍如同光芒四射的烛光，把人生之路照得耀眼通明；来者从光亮中认识了人生的意义，去者似蜡烛燃尽，照亮了别人。”我认为用这句话来表述我国千古名著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和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，应该是合适的。

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们前后历时19年，呕心沥血，撰著了《资治通鉴》。全书294卷，另有《目录》30卷，《考异》30卷。《资治通鉴》自《周纪》迄《五代纪》，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共1362年的历史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900余年来，始终为世人所赞扬推崇，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为华夏文化遗产之双璧，蜚声海内外。司马光本人也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之双绝——“两司马”。该书共刊刻70余版，而且至今还是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，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之罕见，足见其影响之深远。为研究这部体大精深的著作，自宋神宗以来，历代出现不少专著，形成了专门的“通鉴学”。我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评论说：“（《资治通鉴》）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，录事之求实考信，通古今之变，兼收并蓄，拾遗补阙，而成为学史、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，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，通鉴于后人，有资于治国，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，普通大众不可不读之书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，他非常痴迷这部史学名著，前后共读了17遍，某些章节的书页已变得残破不堪。他屡次向各级领导大力推荐这部史学名著，对司马光及《资治通鉴》都有极高的评价。他说“司马光可说是毅力、有决心噢，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。”

作为一部供皇帝阅览和资政的御用史书，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“详”与“实”。对于历史中重大的事件，司马光必备陈其因果，不敢以丝毫的简率而罔

君，这是其“详”；而对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乃至时间、事物等，作者描写务求其真、其准，不敢以半点的虚假而欺君，这是其“实”。

当然，《资治通鉴》中也有一些封建糟粕，全书主脉又强调帝王沿革而轻视经济，其中心思想是力维正统，排斥异端。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必须注意的。

当今社会，竞争日益激烈，人们忙于各自的工作，难得有整块时间来阅读历史著作，对洋洋294卷的《资治通鉴》更是没有时间通读，但人们又有了解历史知识、总结历史经验、吸取历史教训的强烈愿望，这是一个矛盾。蓝天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《经典点睛〈资治通鉴〉》，就是让人们能在较短时间里对《资治通鉴》有个基本了解，并对所阅读的内容做些思考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我们首先对司马光本人的生平事迹作了扼要介绍，不求全面，只求能反映司马光的人格特点。其次对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撰目的、编撰过程、价值和意义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。读《资治通鉴》当然要读其内容，为此我们以7个专题，节选《资治通鉴》中的名篇、名段，并加以简要评介。最后，我们节选了司马光一些有名的历史评论，通过这些历史评论，可了解司马光是如何看待历史、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。

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正是蓝天出版社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战略眼光，策划了这套“经典点睛”丛书。同时他们在此书的编辑、出版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，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！在编著过程中，我们吸取和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。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之编著者水平所限，书中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，敬祈读者赐教。

李传印

2007年12月于武汉武昌喻家山麓



• 目 录 •

第一篇：司马光和《资治通鉴》..... 1

《资治通鉴》历来被称为帝王教科书，为官从政者案头宝典，其中的原委将在这里娓娓道来。司马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历来都说他保守，反对变法。但谁都知道司马光清正廉明，在中国古代混浊的官场上卓然特立，这里，选择几个特写镜头，让你了解司马光的为官、做人，了解他的才情和一个性情中人的魅力。

一、“独乐园”里著《资治通鉴》..... 1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写作的时代背景

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来是两个好朋友，私交甚厚。但是从1071年起，司马光蛰居在洛阳15年，远离政治的喧嚣，潜心撰修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为何要离开都城汴京到洛阳闭门著书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说来话长。

二、清如水、直如矢的司马光..... 12

——司马光其人

司马光反对变法，但他是中国历史不多见的好官，好就在他清、正、廉、明。司马光刻板、固执、倔犟，但一首《西江月》也透露出他内心里春的气息和隐藏得很深的风景。

三、为官从政者的案头书：《资治通鉴》 24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简介

人们都知道，中国历史有一个发展怪圈：每个王朝走过的都是建立—兴盛—衰落—灭亡的相同之路，也就是说，再强大的王朝，最终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。其中的奥秘，《资治通鉴》作了回答。当然，政治上的尔虞我诈，你死我活的斗争，《资治通鉴》也把它血淋淋地暴露在你面前。据说毛泽东一生中把《资治通鉴》读了17篇，有些重点篇卷，都已残破不堪。

第二篇：选读评介 53

一、千古兴亡多少事 53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

千古兴亡多少事，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历史发展是必然，也是偶然，正是这些必然的和偶然的事件和人物，辗出的才是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历史痕迹。

二、治国平天下 118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治国智慧

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是中国古代君子向往和追求的人生目标。治国如烹小鲜，烤得香喷喷，但又不要烤烂；治国如下棋，排好兵布好阵，方可克敌制胜。烤鱼和排兵，都是有诀窍的。在这里，或许能找到一些可供鉴用的治国安邦的方法，其中无论是正面典型，还是反面教材。

三、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 154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治国用兵的智谋

刘邦得天下后，有一天在朝廷上踌躇满志，要大臣们谈谈他是如何打败项羽，登上皇位的。大臣们个个争先恐后地说些肉麻的颂扬之词。刘邦并没有被这些谀词冲昏头脑，他说了这样一席话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餉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众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”历史上还有哪些奇谋胜算？张良、诸葛亮，还有……

四、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 179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战争

战争是政治的继续。战争是血与火的洗礼。

五、留得清气在人间 199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正气

文天祥在元朝大都昏暗的囚室里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《正气歌》。

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，沛然塞苍冥。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”

这种正气，撼天地，泣鬼神，与天地同在，与日月齐辉。

六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 225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宗室之乱

曹植是曹操的小儿子，从小就很聪明，诗也写得很好。曹操死后，曹植的哥哥曹丕当上了皇上。曹丕很不喜欢曹植，一心要害死他。相传有一次他命

曹植在走完七步路之内做出一首诗，要是做不出，就要杀头。曹植边走边思考，结果，七步没走完，诗就做出来了，这就是名传千古的《七步诗》：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。这种同室操戈，也曾把中国历史染得猩红。

七、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 256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奸佞祸国

翻一翻《二十四史》，上面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奸臣巨贪，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共通之性：厚颜无耻，心黑手辣。“党同伐异，便己肥家”正是历代奸臣巨贪们的处世原则。当然，奸臣们也有自知之明的，比如有一则明代小令，便借一白脸奸臣之口唱道：“别人骂我是奸臣，我做奸臣笑别人；你在生前早丧命，我到死后留骂名。”慢慢琢磨，细细品味，此语不啻为一种自我嘲讽，更是肮脏心灵和阴暗灵魂的大袒露。司马光笔下的奸佞是怎样祸国殃民的呢？

第三篇：名言警句 272

历史有时要“倒”着看，要“近视”；现实有时却要“顺”着读，要“远视”。登高才能望远，探幽必临深渊。现实中的一切，总能找到它们的历史影子，历史书卷里的众生百态，喜怒哀乐，也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它们的现代版本和演绎注释。

一、为君之道 272

二、为人之道 284

三、治国之术 293

第一篇：司马光和《资治通鉴》

《资治通鉴》历来被称为帝王教科书，为官从政者案头宝典，其中的原委将在这里娓娓道来。司马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历来都说他保守，反对变法。但谁都知道司马光清正廉明，在中国古代混浊的官场上卓然特立，这里，选择几个特写镜头，让你了解司马光的为官、做人，了解他的才情和一个性情中人的性格魅力。

一、“独乐园”里著《资治通鉴》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写作的时代背景

洛阳自古帝王都。北宋时期的洛阳称为“西京”（北宋都城在开封，称汴京）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一千多年，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，坐落在北宋洛阳城东北一处简朴幽雅的庭院就会浮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这是一座独门小院，简朴又不失清雅，幽静而不乏生机，通幽曲径，香花鸟语，听不见尘世喧嚣，有一种置身红尘外的清静。这座小院就是北宋名臣、《资治通鉴》主编司马光在洛阳的家，也是他读书、著书的地方——“独乐园”。

“独乐园”，不仅因为有个道骨仙风的院名和清雅宁静的环境，令人神往，而且由于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是在这座园子里，历时15年，呕心沥血，编写完成了历史名著《资治通鉴》，更值得人们追忆。

那么，读者一定会问：司马光为什么不在都城汴京撰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却要跑到洛阳这个看来颇有些寒碜的“独乐园”里来著书立说呢？事情还得从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政治斗争说起。

（一）山雨欲来风满楼

公元960年，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建立北宋王朝。赵匡胤以其大智大慧，杯酒释兵权，巧妙地解除了那些骄横跋扈的武将们手中的兵权，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几百年政治混乱、兵连祸结的动荡局面。同时，赵匡胤刚柔并济，分割相权，推行保甲制度，天下重新归于统一，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如臂之使指那样灵活自如。然而，历史车轮辗过80余年的风霜雨雪，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，没有及时因革损益，它们的消极面也逐渐表现出来。到宋仁宗统治时期，北宋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。朝廷内外，官多民少，十羊九牧，行政机构重床叠屋，宛若龙钟老人，运转不灵。官僚和地主竞相兼并土地，形成“势官富姓，占田无限”的局面，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。土地集中和兼并，就意味着农民倾家荡产、流离失所，阶级矛盾日渐尖锐，农民起义一年多如一年，一伙强于一伙。北方的辽，西边的西夏也虎视眈眈，屡屡兴兵，息兵多年的宋辽、宋夏边境又失去往日的宁静。北宋朝廷入不敷出，财政日见窘迫。“冗官”、“冗兵”和“冗费”三冗，消耗着皇皇大宋的元气，而日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危局之中。

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”这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里的名言。面对时局，一些志士仁人，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僚士大夫，看到北宋王朝已不能再继续这样统治下去了，必须采取措施，改弦易辙，革除弊政，才能挽救宋王朝这座大厦于将倾之中。宝元二年（1038年）宋祁上疏，主张裁减官员，节省经费。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“朋党”，对他们加以排斥和打击。在这些对时政不满，要求改革弊政的官员中，核心人物是范仲淹。

（二）范仲淹掀起改革的“盖头”

范仲淹（989—1052年）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（今苏州市）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但他刻苦读书，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进士及第，开始了宦游生涯。他在任地方官吏时，很注意兴修水利，兴办学校，关心时政得失，获得了“清正”的名声。宋仁宗天圣六年（1028年），范仲淹上书言朝廷得失，民间利病，为宰相王曾、晏殊等人所赏识，推荐入朝。景祐二年（1035年）权知开封府（相当于开封市市长）。当时朝野内外舆论普遍认为：“朝廷无忧有范

君，京师无事有希文”。景祐三年，范仲淹上《百官图》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，又上书讥切时弊，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。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、引用朋党，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。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在范仲淹遭受排挤时，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，有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、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。余靖上疏为范仲淹申辩，尹洙则上疏表示他能与范仲淹结为“朋党”为荣，蔡襄作“四贤一不肖”



范仲淹像

诗赞誉范仲淹、余靖、欧阳修和尹洙，讽刺不能为范仲淹申辩的谏官（负责监察官员违法行为的官吏，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监察官员）高若讷。当时尽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罢官，但斗争却没有因此而停止，不断有人上疏要求复用范仲淹，反对用“朋党”的罪名堵塞言路。欧阳修还作了著名的《朋党论》呈献给宋仁宗，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，君子、小人都各有朋党。凡小人朋党得势，就会以朋党为名排斥君子朋党，国必乱亡，要求宋仁宗以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之迹为鉴，“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。这些所谓“真朋”与“伪朋”的对立，实质是当时要求革新朝政的势力同守旧势力的斗争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初，北宋在对西夏战争惨败后，农民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，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。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“遂欲更天下弊事”，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（宋代枢密院主要管军事，首脑是枢密使），任命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人为谏官，七月，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（相当于副宰相）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，任命富弼、韩琦等为枢密副使。这一班朝臣中，名士居多，士大夫交口称赞，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。宋仁宗在召对（宋朝皇帝召见有关官员讨论国家大事）中，对范仲淹、富弼等特别礼遇，并曾多次催促他们立即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。于是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声浪中，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，并加以补充发挥，于庆历三年九月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奏折呈给宋仁宗，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。

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：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、“精贡举”、“择官长”、“均公田”、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、“减徭役”、“覃恩信”、“重命令”。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，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、病患、贪污、无能之人。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，连续颁布几道诏令，规定：（1）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，注重以实际的功、善、才、行四个标准提拔官员，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职犯罪者。（2）严格恩荫制。限制中、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（这是一项官吏的特权。根据官位高低，每个官员可以有若干子女或亲属直接进入官），防止权贵的子弟亲属垄断官位。（3）改革贡举制。令州县建立学校，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。改变专以诗赋、墨义取士的旧制，着重考试策论和考察操行。（4）慎选地方长官。由中书、枢密院慎选各路、州的长官。由各路、州长官慎重选择各县的长官。（5）改进职田法。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，余下的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，以“责其廉节”，防止贪赃枉法。（6）“减轻徭役”。将西京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阳东）的五县废为镇，又析王屋县（今河南济源西）并入河南府，精简乡村行政机构以减少费用支出。但范仲淹、富弼提出的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等建议则并未真正实施。

范仲淹的各项改革，在当年和第二年初陆续颁行全国，号称“庆历新政”。庆历新政的推行，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，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，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，有些庸碌无能的官员确实被撤掉了。庆历三年十月，北宋从整顿吏治出发，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了几天，首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。范仲淹在提名时，翻阅名册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。富弼对他说：“范六丈公（指范仲淹）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。”范仲淹却说：“一家哭，怎比得一路哭呢？”坚决罢免了那种不称职的官员。正因为如此，主持“新政”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，攻击范仲淹、富弼是“朋党”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。

“朋党”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。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，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，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，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，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。

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，宋仁宗于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诏减百官，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，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，不得不起用范仲淹，并委以改革重任。当朝廷上下、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，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。特别是当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，欧阳

修的《朋党论》、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有朋党之时，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，罢去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，让他出任陕西、河东宣抚使。到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初，范仲淹、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、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。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，已经颁行的磨勘（考绩）、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，“庆历新政”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如昙花一现地夭折了。

庆历新政失败了，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，一场更大规模、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。

（三）王安石主政变法

宋仁宗做了40年皇帝，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、包拯等这样一些正直的大臣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社会问题，国家越来越衰弱。宋仁宗没有儿子，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，这就是宋英宗。英宗即位4年，就因病去世了。年方20岁的太子赵顼（xū）即位，这就是宋神宗。



范仲淹《洪范政鑑》序言

宋神宗是个有血气、有雄心、有远虑的青年。在他登位之前，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。他在宫廷里建造了一批库房，每个库房都以一个字为库房的名称，把这些库房名字连贯起来，是一首四言诗：

五季失图，猗猗孔炽。艺祖造邦，思有惩艾。

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。曾孙保之，敢忘厥志。

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就是：五代十国时期由于统治者缺乏计谋，以致蛮夷戎狄猖獗。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，企图挽回这种颓局，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，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。我们这些做子孙的要继承祖业，岂敢忘记太祖赵匡胤的遗志？

要改革，要布新，谈何容易。因为改革就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必然要涉及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从而遭遇种种阻力。宋神宗要改革，但他周围的人，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，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，也变得暮气沉沉了。宋神宗想，要改革现状，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。

宋神宗即位前，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，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，神宗经常称赞他。韩维很坦诚地说：“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。”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，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。现在他想找助手，自然想到了王安石，于是就下了一道谕旨，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。

王安石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人，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（他的散文写得很好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）和政治家。他年轻时，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，得到欧阳修的赞赏，20岁中进士后，做了几任地方官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，不仅

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，而且也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农民不断失去土地。由此王安石认为，宋朝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：“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，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。”因此，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王安石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。这封历史上有名的“万言书”，分析了宋



王安石像

朝内忧外患交织、财政日益困穷、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，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，要求宋仁宗以汉、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，果断实行变法。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、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。这封“万言书”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，却没有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回应。因为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，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，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了一边。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，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，辞官回家，过起韬光养晦的生活。

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正月，宋神宗赵顼即位。神宗立志革新，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。但是富弼等人一再规劝神宗，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。这与宋神宗图富图强的意思明显不合，从此，宋神宗不再倚重这班元老重臣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，宋神宗召“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”的王安石入京，要依靠他来变法立制，富国强兵，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。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，士大夫们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，太平可立致，生民咸被其泽。这一回，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诏令，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，就高高兴兴应召赴京了。

王安石一到京城，宋神宗就请他单独进宫谈话。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：“你看要治理国家，该从哪儿着手？”

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：“先从改革旧的法度，建立新的法制开始。”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。王安石回家以后，把他的改革思路写成一份意见书，呈送给宋神宗。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，更加信任王安石了。公元1069年，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。那时候，朝廷里名义上的四名宰相，病的病了，老的老了，有的虽然不病不老，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。王安石知道，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，经过宋神宗批准，便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，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，把变法的大权抓了过来。这样，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。为了推动变法，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——制置三司条例司（后来条例司废止，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），并与吕惠卿、曾布（都是王安石的学生）等人一道草拟新法，各路设提举常平官，督促州县推行新法。就这样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，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。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的8年内，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，陆续实行了均输、青苗、农田水利、募役、市易、免行、方田均税、将兵、保甲、保马等新法。

（四）“拗相公”与“司马牛”

过去曾有一部戏，戏名叫《拗相公》。“拗相公”这是王安石的外号。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第四卷《“拗相公”饮恨半山堂》里也有这样一段：

（王）安石既为首相，与神宗天子相知，言听计从，立志弄出一套新法来。几件新法即农田法、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均输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保马法、方田法、免行法。专听一个小人，姓吕名惠卿，及伊子王方，朝夕商议，斥逐忠良，拒绝直谏。民间怨声载道，天变迭兴。荆公自以为是，复倡为三不足之说：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”因他性子执拗，主意一定，佛菩萨也劝他不转，人皆呼为“拗相公”。文彦博、韩琦许多名臣，先夸奖说好的，到此也自悔失言。一个个上表争论，不听，辞官而去。自此持新法益坚。祖制纷更，万民失业。

这段话虽然出自小说，但把王安石的个性勾勒得很形象、生动。王安石有个“拗相公”的诨名，而司马光也有苏轼送给他的雅号：“司马牛”。两个个性分明的人在政见上如果不合，必然导致尖锐对立。

有一次，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，问他说：“外面人都在议论，说我们不怕天变，不听人们的舆论，不守祖宗的规矩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王安石坦然回答说：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”意思是陛下认真处理政事，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；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，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；再说，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，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，又何必怕人议论；至于祖宗的老规矩，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。

王安石坚持三不怕，其他许多大臣可不是这样认为的。司马光就主张三不变，他说：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祖宗之法不可变。”一个是“三不怕”，一个是“三不变”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是否进行变法的问题上已经是冰炭不相容了。

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、增加国家收入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也触犯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。围绕是否要变法，如何变法的问题，在北宋朝廷上引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政治斗争。斗争的一方是人称之为“拗相公”的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，另一方是以“司马牛”——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派。

王安石这位“拗相公”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，不管是朋友方面，还是政敌方面。他能言善道，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，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